

香港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方骏 熊贤君◎主编



香港教育史
是中国教育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湖南人民出版社

香港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方骏 熊贤君◎主编



香港教育史
是中国教育园地中的
一朵奇葩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教育史 / 方骏, 熊贤君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438 - 6665 - 2

I. 香… II. ①方…②熊… III. 教育史 - 研究 - 香港
IV. G527. 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9538 号

香港教育史

主 编: 方 骏 熊贤君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杨 纯

装 帧 设 计: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亚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35

字 数: 59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665 - 2

定 价: 8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绪论

- 一、香港教育的性质 /001
- 二、香港教育的历史分期 /003
- 三、香港教育的特点 /011
- 四、香港教育的成就 /018

第一章

英国统治前的香港教育（1841 年前）

- 第一节 传统的私塾教育 /024
- 第二节 香港学子的科场表现 /033

第二章

殖民者登陆时期的香港教育（1841—1859）

- 第一节 自由的教育政策和初期的教育行政 /040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中文私塾的发展 /045
- 第三节 教会教育的兴衰 /052
- 第四节 香港早期的留学生 /081

第三章

殖民教育培植时期的香港教育 (1860—1911)

- 第一节 教育政策的调整 /096
- 第二节 教育行政管理的健全 /110
- 第三节 官立学校的植基 /120
- 第四节 私立学校的复盛 /140
- 第五节 补助学校的扩充 /155

第四章

殖民教育发展时期的香港教育 (1912—1941)

- 第一节 教育政策的嬗变 /167
- 第二节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定型 /176
- 第三节 官立基础教育的完善 /181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定型 /189
- 第五节 私立学校和补助学校的规范 /196
- 第六节 香港大学的设立 /210

第五章

沦陷时期的香港教育 (1942—1945)

- 第一节 日军对香港教育事业的破坏 /220
- 第二节 日军实施的中小学奴化教育 /226
- 第三节 日治期间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 /241
- 第四节 学校教育的重重困境 /248
- 第五节 反奴化教育及重光后对奴化教育的清算 /253

第六章

重建与昌盛时期的香港教育 (1946—1979)

- 第一节 战后教育行政的调适 /260
- 第二节 “统一学制计划”的实施 /271
- 第三节 幼儿教育的起步 /281
- 第四节 小学教育的普及 /288
- 第五节 中学教育的艰难迈进 /304
- 第六节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的肇基 /317
- 第七节 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办理 /327
- 第八节 专上教育的创办 /340
- 第九节 钱穆和吴俊升的教育思想 /353

第七章

面向回归过渡时期的香港教育 (1980—1997)

- 第一节 教育行政机关和咨询机构 /369
- 第二节 幼儿园教育的健康发展 /378
- 第三节 初等教育的改革提高 /388
- 第四节 中等教育的优质化和有序化 /401
- 第五节 教师教育资源的整合 /422
- 第六节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433
- 第七节 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开展 /440
- 第八节 私立教育的提升 /450
- 第九节 高等教育的扩充 /460

第八章

回归后十年的香港教育 (1997—2007)

第一节 各项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 /488

第二节 教育改革的成绩与问题 /501

第三节 教育改革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 /507

主要参考文献 /512

附录 香港教育大事记 /517

后 记 /554

绪 论

香港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香港教育的开端尽管先于香港开埠，早有传统的教育形式存在，但是香港近代教育却是从香港开埠开始的。随着香港的开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教育传统在这一特定区域、特定的时间内，不断与外来文化和外来教育思潮交会、冲撞、融摄，从而发展起来一个具有鲜明的现代都市文化、殖民地特征的中国教育的分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教育史确立了它自身的价值和位置。

一、香港教育的性质

文化是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温床和动力，不仅限定了教育的存在形态、运动方式，同时还赋予教育一定的文化内涵。而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对文化有着一定的反作用，教育自身的丰富、改革和发展，不仅提升着文化的精神，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考察、描述与研究香港地区教育产生、发展，很有必要对地方文化环境进行探索，把握住地方文化环境的特质，深入研究文化对于地方教育的影响，以及地方教育的超越对文化发展进步的意义；紧紧把握住香港迥异于中国内地特殊的文化环境赋予的形态和内涵，以及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教育整体格局的作用和意义。

远在 6000 年前，就有先民在现今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活动。香港地区的考古发掘获得的石环、印纹陶器、夔纹硬陶器及青铜器等大量分属新石器中晚期和青铜时代的遗物，都是明证。在秦汉时期，香港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为畚、徭、蛋等土著聚居之所。汉代改隶属博罗县，并已经有中原人迁徙至此。以后，在中原内地时有战乱的朝代更迭中，避难南迁者不在少数，尤以东晋末年和南宋末年为甚。唐代香港地区设置屯门镇，管辖从今宝安、屯门到

浙江永嘉一带沿海地域的海防军务。北宋年间,开辟盐场,增设盐官专督其职。元代改置巡检司。宋元明时期,香港地区煮盐、捕鱼、种香、植稻以及利用蛎壳烧灰,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清代中叶,香港岛沦为英国殖民地前,人口达7000多人。香港位于珠江口外侧,与广州相距仅130公里的特殊地理位置,唐代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无不认识到它是沟通东西方交通和入粤的重要通道。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沟通东西方的新航线,珠江口外的屯门便成为麋集西方商人、冒险家和殖民者的最早贸易港口。香港的特殊时空环境,决定了古代香港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而是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部分,纳入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框架之内。它说明香港古代文化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五岭之南的分支——岭南文化的一翼。

“岭南文化”是原生于五岭之南的百越先民在秦汉之后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合,并经长期的历史实践逐步形成的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区域文化类型。岭南文化既是一种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也是一种包容广泛的移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中原内地稳固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内陆型文化,它是面对广阔域外世界的海洋型文化;它不同于以达官显贵、豪绅地主、文人学士为主要文化形象的贵族文化、士人文化,它是以市井社会的城市平民为主要文化形象的市民文化、世俗文化。其本性使其在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融合和外来文化的冲撞过程中,能不断地吸取各种养分以丰富发展自己,而不失去自身的本根形态和固有的“土”的特征。考察香港各时期的教育改革,无论是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社会教育,都无不在“贵族”和“平民”两者中“左顾右盼”,都可能看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英美文化教育渗透的蛛丝马迹。

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导致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以西方文化作为自己文化意识代表的英国殖民者,通过香港殖民政府推行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借助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势,通过大量英文书院和专上学院所奉行的英式教育制度和英语教学,通过举办英国文学讲座、资助交响乐、芭蕾舞、现代剧等西方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扩展英国精神文化的影响,希冀西方文化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文化。无疑,香港近代文化一直处在西方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夹击之中。两种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冲撞、融摄、共处和反弹,形成了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的香港社会独特的文化格局。西方文化以其殖民主义为背景,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威慑力,而岭南文化则以其博大、深厚的历史稳固性和源源不断的内地支援而难以被撼动根基。两种文化在香港这个交汇点上各不相让互不调和、各据一方,但又呈现出互相渗透的胶着纠葛态势,形成了香港特异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带来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观念,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为香港成为一座以

世界经济为背景的现代化的国际性经贸都市奠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支撑着大量华资企业坚忍不拔、埋头苦干,为香港经济的提升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在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在固守自身传统的稳定性与对异质文化的冲击相抗争的同时,也表现出宽容大度,吸收外民族文化的优长,使自身也得到发展。——表现出岭南文化的本根性融摄其他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的自主精神和兼容其他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点。

香港社会性质的特异性,使得香港既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化的现代都市,也不是一个饱浸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城廓,而是一个华洋杂处、东西并存、各据一方,又相互交会,在沟通中国与世界上发挥着桥梁作用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中国城市。东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既层次泾渭分明地判然有别,亦界限模糊地融合渗透。文化质的规定性决定了香港教育的特质。譬如,香港政治、经济领域和专上教育,较多地接受了英国的殖民影响,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实行3年学制^①,就是从英国接受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在包括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基础教育和文学艺术等狭义的文化和教育上,占据香港人口绝大多数中下层社会,却依然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和主导。基础教育与中国内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学制上除了保留预科制外,大同小异。在社会教育上,尽管英国实行殖民统治长达155年之久,但是香港中下层社会在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还是明显保留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流风余韵。即使是专上教育,也在是否保留预科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②从总体上看,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基础教育,都明显地呈现出“华洋杂处”、“东西并存”、“各据一方”、“相互交会”的特质。

二、香港教育的历史分期

香港教育产生发展经历了由传统教育到殖民地教育的演变过程。前后两个时期明显地以1840年香港割让为界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为了对香港教育的特质和特征有准确的把握,可将香港教育划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① 根据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2005年5月发表的[3+3+4]学制报告书,香港的高等院校将于2012年实行4年学制。

② [3+3+4]学制报告书同时指出,香港高中将于2009年实行3年学制,届时2年预科教育将成为历史。

（一）英国统治前的香港教育（1841 年前）

早在宋代，在现今香港境内就有一位名叫邓符协的创办了力瀛书院。清代现在的香港地方，未归英国统治前隶属于新安县。新安县书院中能够具有规模、著有声誉的，有宝安书院、文冈书院和凤冈书院等几间。这些书院虽不在香港境内，但是由于与香港地方毗连至近，而且属同一县治，对香港的文风及士子科第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清代旧学舍遍及全港各地。那些正式为教育下一代而设立的书塾、书室一类的学舍外，各村各族所兴建的祠堂，差不多都是用作兴学育才的地方。1840 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香港的教育基本上是与内地别无二致的传统教育。

（二）殖民者登陆时期（1841—1859）

西方国家在教育上有着一个重要传统，教会多率先在西方国家所在地开设学校。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人在登陆香港后到 1859 年间，英、法、德等国不同教会香港开办了 20 多所学校，旨在传教及训练一些可以帮助传教的华人。1842 年 2 月，英国驻华使臣兼商务监督璞鼎查接受该会理事会申请，拨地供他们修筑校舍。当年 11 月初，马礼逊书院由澳门迁至香港，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美国公理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等纷至沓来传教的基地。这些学校除宗教科目外，还有一些普通课程，如英语、地理、常识、算术等，也有一些诸如中国蒙学教育的课程。不过，由于风气未开，这些学校的规模均不大，所招收的学生不多，而且大多在掌握了英文后便离校，对于宗教和其他课程并无大的兴趣。他们离校后大多到政府或是商行担任文员。因此，很多学校因为达不到传教的目的被迫关闭。到 1859 年，全港只剩 3 所教会学校。尽管如此，这些学校还是训练了一批可担任翻译及中西商务人才，其中有一些在后来成为推动清末现代化的著名人物，如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枢、伍廷芳等，他们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学校更成为现代著名的中学，如圣保罗男校、英华书院、拔萃男校等学校的前身。^①

英国殖民统治之初，当地居民出于对英国人的反感和对一种外来制度的隔膜，很少有人愿意送子女进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学校读书。教会学校遇到的这种尴尬态势，直接成为中文书院发展的原因。1844 年港府首次公布这类学校数字为 7 所，次年升至 9 所，学生达 145 人。1947 年港府首次对 3 所学塾予以资助。据港

^① 吴伦霓霞：《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

府中英文通告称,这些受资助的中文学塾可由政府提供教室以及教师薪金,学生只需每月给教师缴纳铜钱25文“以作茶资之用”,不必缴纳学费。到1854年,完全免费的学塾共有5所,这是香港岛最早的官立学校。到1859年,增加到近20所,学生达937人。香港政府每年拨发的教育经费上升到1200镑。^①这些官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初级中文、中国经典、地理及英语等科目。

香港早期殖民教育发展并不顺利,这与中国人不认同外来文化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强大惯性有关。

(三) 殖民教育培植时期(1860—1911)

1860年,英人占领九龙半岛。翌年,港英政府接受理雅各的建议,设立一所由政府直接管辖的中央书院。其时,香港人口已逾12万,商埠地位及政府行政亦踏入统整阶段,对于通晓中英文的人才颇感需要。中央书院的诞生,说明香港政府的殖民教育政策进入培植时期,也为后续的发展与演变奠定了务实及功利的教育目标,同时培养一些通晓英语的精英分子也成为港英政府教育政策的取向。

中央书院采英国文法中学体制,校长由来自英国亚巴甸大学的史钊域担任。开办时注册学生约有200人,但每年投考人数远超所能供应的学额。1889年迁入新校舍,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复更名为沿用至今的皇仁书院,人数增至1000名左右,大多来自香港中层及商人阶层,也有一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在皇仁书院肄业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分子,在商界或专业获得显著成就;也有一部分成为清末改良及革命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何启、陈锦涛、孙中山、王宠惠等。初期课程中英文并重,但自1878年在港督轩尼诗指引下,开始增加英语授课。并逐步取消原来的科目,代之以英国的文学、几何、三角、绘图、簿记等。到1905年,中文科目授课时间减至5节左右,余均为英文科目。^②中央书院奠定了所谓“英文学校”的课程模式。

香港政府从中学塾发展过程中摸索到了通过资助办理和发展殖民教育的经验,通过资助办法推进在香港的殖民教育。1870年英国通过法例,实施强迫性普及教育。但香港政府无意于此普及香港义务教育,但通过补助教育办法推进殖民教育。1873年,港英政府通过《补助书馆计划》,对教会办学予以大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规定有关学生人数、课程等须遵循政府规章,要接受政府监督。

^① 操太圣:《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修订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6页。

^② 吴伦霓霞:《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页。

此办法经 1877 年、1879 年两度修改，取消了原先对学生人数和宗教科目的限制，及 1893 年增加对校舍、设备的资助后，接受资助的教会学校激增到近 100 所，学生人数上升到近 4000 人。到 1900 年，为中国学童就读的政府学校仅有皇仁书院、庇理罗士女校，外加上 4 所设有 3—5 年学制的分区英文小学，学童仅有 1700 名左右，仅为补助学校的一半，但后者则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的教会办的华文小学。^①

港英政府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实行经费资助，以影响学校发展，是这一时期香港殖民教育的又一特征。1853 年，教育经费在当年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 0.3%，但 10 年后的 1863 年上升到 1.07%，再过 10 年的 1873 年跃升为 3.08%，又过 10 年的 1893 年，增长到了 4%^②。所有这些举措显示出港英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和影响的加强，其结果是较大程度地促动了香港教育的发展。

这一系列举措为港英当局在香港推行殖民教育奠定了根基。

（四）殖民教育发展时期（1912—1941）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种政治运动都渗透到香港各级学校，港英政府视如洪水猛兽，制订出台各种法规条例，加强对香港所有学校的监督和管理。1913 年 8 月，经立法局通过了《1913 年教育条例》，这是香港第一个经由立法程序通过的教育法规。条例规定所有公、私立学校，均须接受政府的监督。条例规定，除获得特别豁免者外，所有学校一律要依法向教育司署注册，并要遵守条例的各项规定。未经注册的学校被认为是“非法学校”，开办者可能被起诉罚款。还制订并公布了《教育则例》，明确了教育行政必须依循的规则，使管理工作法规化、程序化。

条例颁布实施后，香港各类学校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校学生数急剧增加。官立学校达到 20 所。政府各类补助学校达 18 所，而津贴学校数目远远大于补助学校，达 281 所，在校学生数 21777 人。这些津贴学校包括英文学校、汉文学校，还有旧式私塾。

私立学校须到香港教育司署注册。这一时期注册者高达 932 所，注册学生人数有 65230 人。其中有 145 所英文学校（包括 6 所中学，133 所小学，6 所职业学校）和 778 所汉文学校（其中中学 101 所，小学 675 所，职业学校 2 所）。^③ 可

① 吴伦宽霞：《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9 页。

②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15 页。

③ 操太圣：《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20 世纪中国教育（四）》，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第 2938 页。

以说, 条例和则例的颁布, 使香港教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 这是香港教育与探索机构。1901年委员会成立, 次年便发表报告书, 提出了加强英语教育和推行精英教育两大重要政策。1912年又成立了香港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早在188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在香港建立一所大学的建议, 但大都认为条件不成熟, 亦非当时社会所急需。1908年, 港督又一次提出此建议, 促成香港大学破土动工。香港大学仿英国大学模式, 采英文为教学语言, 是一所不折不扣的以英式教育为蓝本的帝国大学。香港大学在成立之初仅设有香港西医学院合并成的医学和新设的工学院两院, 翌年始增设包括理科及英国语文、历史等学系的文学院, 中文则只为选修科。港大首批学生共72人, 除本地学生外, 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广州和中国内地城市的青年学子, 实现了大学不单只是为香港而设立的目标。^①

这一时期的发展是显著的, 探索也卓有成效, 也是颇有价值的。

(五) 沦陷时期 (1942—1945)

1941年12月, 日军攻占香港。在日军统治时期, 香港人口锐减, 许多学校关闭, 还有一些迁徙辗转内地, 给刚有较好发展的香港教育带来灭顶之灾。1945年香港光复前, 只有中学15所, 学生约600人; 小学仅有56所, 在校学生大约5000人。仅有一所高等学校——香港大学停办。沦陷前刚刚起步的教育对外交流被迫中断, 代之而起的是单一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日治时期, 香港教育并未显现“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共荣”迹象, 而是出现严重倒退, 为香港光复后的重建带来种种困难。

(六) 重建与昌盛时期 (1946—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国际国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所面临的是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解放战争爆发, 大量的人口涌入香港, 给香港带来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 使得香港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逐渐转型。港英政府抓住发展的有利时机, 也迫于形势和压力, 对旧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 因势利导, 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 修正低限度承担原则, 以普及教育取代“精英教育”, 逐步建立了以智力投资为主导的、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香港光复后, 港府重组教育司署来管理教育事宜, 构建了由三个层面组成的

^① 吴伦宽震:《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 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700页。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最高层面为教统科和教育统筹委员会，中间层面是教育署和教育委员会、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工业教育及职业训练署和劳工署；第三个层面是学校行政组织。大力推行依法治教是这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港府制订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推行依法治教，依法治校。1971 年对《1913 年教育条例》进行全面修订，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学校注册、校董会结构、教员招聘、学生编制、收费、卫生及安全设施等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均须遵循不同的条例和规例，诸如《幼儿中心条例》、《专上教育学院条例》、《学徒条例和规例》之类。一些独立的大学也制订了相应的法例。

港英政府面对战后教育发展所受的主要冲击，是来自香港人口的激增和经济模式的转变。战后英帝国的没落也使得港英当局淡化了传统政策趋向，时代生活对新知识、新科技的需求等，无疑也是重要因素。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走向普及化、多元化和决策机制的开放，这些都是战前教育所无法比拟的。第一，1951 年《菲莎报告书》的发表，忠告政府小学教育不能、也不应只交给民间办理，师资训练政府亦责无旁贷。第二，1963 年《马殊—森逊报告书》的发表，提出增设津贴学校、向非法牟利私立学校买位、小学入学年龄升至 7 岁的建议。1965 年《教育政策白皮书》建议：小学入学年龄改为 6 岁、增设政府补助及津贴学校、加强巡视及取缔私立小学滥收学生，为香港实施小学义务教育铺平了道路。第三，成立香港中文大学，1963 年，鉴于如下 4 个方面的原因创办了中文大学：（1）香港大学已无法应付升学人数所需；（2）新兴工商业、教育及公共服务极需具备较多大学资历的人才；（3）中文学校体制缺乏一所政府资助及认可的大学，造成中英双轨学制极不平衡，会使社会产生矛盾；（4）三院学术地位已获不少国际学术机构承认，所造就的人才对香港亦作出不少贡献。^① 中文大学的创办，反映了战后香港教育需要配合不可忽视的社会发展力量，亦反映了香港在国际商业及学术地位方面的转变。第四，推行普及教育，1971 年实现 6 年免费教育，1978 年实施 9 年免费教育，使得香港成为亚洲最早完成普及 6 年和 9 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之一。第五，重视教育政策制定的开放与民众的关注。香港教育署一向有很大的权力，在处理较重要的教育事务时，重视聘请英国顾问所提出的建议，政府决策最倚重的咨询机构是教育委员会。1966—1967 年的香港暴动事件使港府醒觉缺乏与民意沟通造成的社会不安，遂改组教育委员会，加入了私校的代表，使之略为平民化。其后的“派位法”的制订、“升中试”的取消等，都得益于广泛咨询、听取民众意见。此后各种教育团体、各大报章亦开始建立论坛，

^① 吴伦霓霞：《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5 页。

增设专栏。1977—1978年的“金禧事件”及1978年提出的推行母语教学的要求，都反映了民间对政府教育政策的不同意见。

(七) 面向回归过渡时期(1980—1997)

1980年，香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上，香港从劳动力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的生产模式，对外贸易的拓展更进一步提高了香港的国际金融、资讯和航运的地位，市民和政府的收入更为丰裕，社会更需要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才。政治上，1983年中英谈判的开始确定了香港回归及“一国两制”的方案。这些表明香港教育进入了面向回归的过渡时期。在教育上有四项特异表现和举措。第一，普及教育的提升。1981年在首批完成免费教育后，获资助升读“中四”至“中五”的学生已经增至65%，1991年复增至85%。^①并按教育统筹委员会三号报告书建议，推行直接资助计划，鼓励办理比较完善的不牟利的私校参加，以增加资助学位及提高教育素质。第二，提供多元化教育。1982年职业训练局成立，接管了原属教育署管辖下的5所工业学院，1986年又增加两所工业学院。这些工业教育学院负责提供技术员及技工程度的工业教育和包括环境学、制衣、商业、电机、酒店等300余种课程。职业训练局还有24个训练中心，提供在职具有“中三”或“中五”程度者兼读或全日课程。1985年，香港演艺学院设立，这是一所提供表演艺术的专上学府。1993年建成的两所科技学院，成为工业学院学生深造和研究提升素质之地。第三，加大教育咨询的开放程度。1981年，教育委员会邀请了由英、德、美、澳4国专家组成的国际教育访问团，对香港教育制度作全面检讨。顾问团所提出的对香港教育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是组成教育统筹委员会，负责统筹全港教育政策。委员会从1985年开始，提出了一系列教育问题报告书，分别就高等教育至学前教育，自课程发展至学生辅导等许多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很显然，进行咨询的开放程度远胜上一个时期。第四，进一步拓展大学教育。1988—1989年，政府制订并实施加速发展大学教育计划，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创办并正式开学。1994—1997年间，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浸会学院和公开进修学院先后通过香港学术评审局评审，升格为大学；又将5所教育学院合并成香港教育学院。政府认可的大学遂拓展到7所，能够提供接近24%适龄青年就读。

通过对香港从学塾和书院教育发展到现在有相当大影响的现代化教育历史进程的历史考察，不仅可以看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状况，更可以总结

^① 吴伦霓霞：《香港教育的发展历程》，顾明远、杜祖贻主编：《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页。

出教育兴替的发展规律，把握香港教育发展的未来。

（八）回归后十年的香港教育（1997—2007）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这之后的十年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997年9月，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了第七号报告书《优质学校教育》，建议教育改革应制定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素质指引，设立素质保证机制；进一步下放权力，使每所学校在财政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落实校本管理。1999年初，教育统筹委员会公布《教育制度检讨：教育目标》的咨询文件，提出21世纪香港整体教育的目标。教统会随后又公布了修订后的教育改革建议，即名为《终身学习，自强不息》的咨询文件，建议对现行的教育体制作“突破性的变革”，如实施九年一贯制的普及基础教育，取消升中派位的学能测验，合并中五会考和中七高考，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大学实行院校学分互通机制等，倡导全面发展，终身学习。2000年课程发展议会公布了名为《学会学习》的课程发展路向的咨询文件，在检视全港现时中小学和幼儿园学校课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信念、两文三语、三个课程架构组成部分、四个关键项目、五种学习经验、六个提升学会学习的师资专业知识、七个学习宗旨、八个学习领域、九个共同能力”的课程发展路向和改革方案建议。经过三个阶段的咨询，教育统筹委员会于同年9月正式发表了《终身学习，全人发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的报告，提出下列改革重点：改革入学机制及公开考试制度，创造空间；改革课程及改良教学法；改良评核机制，辅助学与教；增加高中及以后的多元化终身学习机会；订定有效的资源策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准；实施支持前线教育工作者的措施。2005年5月，教育统筹局又公布《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学制》，宣布于2009年实施“3+3+4”学制（即初高中各3年，大学4年）。

“九七”回归后，特区政府在教育领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就。比较明显的，包括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有相当大的增加；建了不少硬件设备良好的千禧新校舍；许多学校完成了校园改建工程；转为全日制的学校越来越多；教师大量接受再培训并取得更多资格；学生参与的学习活动越来越多样化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九七”以来教育改革的推动往往立足于负面，教育当局大量宣传香港学校和教师的不足，以此作为教改的推动力，加上变革频繁、政策经常前后矛盾、互相干扰，使得香港教育出现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